东地中海危机的“幸存者”*

——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社会的转变

李欢锦　晏绍祥**

内容提要　公元前12世纪，东地中海贸易网崩溃，周边政治体大多陷入危机甚至走向衰亡，塞浦路斯作为东地中海海上交通要道和贸易网络的重要成员，同样受到冲击。传统观点认为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初期的塞浦路斯经历了文明的断裂，并将其归咎于“海上民族”和近东帝国等外来侵略。然而，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这一时期塞浦路斯社会虽然呈现颓败之相，但物质文化特征仍保留较多，不仅有持续繁荣的定居点，青铜时代末期的语言和传统墓葬类型也同样延续到了铁器时代初期，岛上的政治秩序以及与地中海其他地区未曾中断的贸易往来，都对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文明中断的说法提出疑问。而这种社会转变不仅受到东地中海诸文明的影响，也与岛屿内部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条件相关。

关键词　塞浦路斯　东地中海　青铜时代末期　文明交流　社会转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575～前1050年[①]），随着青铜需求的增加和各类贸易的发展，东地中海的赫梯、巴比伦、亚述、埃及、黎凡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地区形成了联系密切的贸易网络，与西部的西西里和亚平宁半岛也有一定的交流和互动。[②] 作为地中海东部最大的岛屿，塞浦路斯从青

* 本文获得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创新项目资助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3年研究生科研立项（2023LS10）资助。

** 李欢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地中海史；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

① 本文的年代划分参见 Porphyrios Dikaio, *Enkomi Excavations 1948 – 1958*, Vol. ii, *Chronology*,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Catalogue*, *Appendices*, Mainz: Von Zabern, 1971, p. xvi, 502, 29 plates。

② A. Bernard Knapp, “Bronze Age Mediterranean Island Cultures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55, No. 2, 1992, pp. 52 – 72.

铜时代中期开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连接埃及、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以及丰富的铜矿资源，逐渐从孤立的、以村庄为主的封闭型岛屿，发展为以城市为中心、对外联系密切的“国际型”社会，在青铜时代晚期迅速成为地中海东部贸易网中的重要成员。①

到青铜时代末期（约公元前 1200～前 1050 年），东地中海各文明相继衰亡，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消失，叙利亚地区诸王国相继灭亡，赫梯帝国因内忧外患被亚述和其他近东国家蚕食，埃及新王国也再难重现鼎盛期的繁荣，甚至远在内陆的中亚述和巴比伦第三王朝也受到波及。随着 19 世纪考古项目的进行，东地中海发生的这些毁灭性灾难和社会转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根据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 1187～前 1156 年在位）在麦地奈特·哈布（Medinet Habu）的铭文记载，众多学者将“海上民族”（Sea Peoples）入侵作为东地中海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对气候、自然灾害、外族入侵等不同因素的思考和讨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该区域文明衰亡的原因各不相同，绝非简单用‘海上民族’所能解释”。②

过去几十年，考古项目取得的重要成果清晰地展示了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的社会图景，繁荣的定居点遗存和未曾中断的物质文化特征，使得“海上民族”入侵塞浦路斯和文明断裂的传统观点受到质疑。国内学者对东地中海青铜时代末期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埃及、爱琴海和赫梯等陆地文明的发展，鲜少从塞浦路斯等岛屿的视角讨论“危机”时期的社会转变。因此，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梳理近年来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社会转变的学术观点，综合分析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呈现的发展特点，深入探讨形成这种特点的内外部因素，进而展现公元前 12 世纪东地中海诸文明社会转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　关于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社会转变的争论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学者开始在塞浦路斯进行大范围的考古活动，

① A. Bernard Knapp，“Production，Exchange，and Socio-Political Complexity on Bronze Age Cyprus，”*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 5，No. 1，2007，pp. 35－60.

② 金寿福：《文明兴衰视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论》，《历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104～124 页；〔美〕埃里克·H. 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 1177 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 236～244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对不同时期的定居点进行分析和讨论。瑞典考古项目中的杰尔斯塔德（Gjerstad）认为，塞浦路斯在青铜时代末期受到外族入侵和殖民统治，文化呈现对立后融合的特点。[①] 根据他的看法，塞浦路斯在青铜时代末期主要遭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两波入侵，一波是来自北方的小亚细亚移民入侵岛屿东部；另一波是来自西部的因多里安人入侵而迁移到塞浦路斯的迈锡尼人，他们对塞浦路斯进行殖民统治，此时岛屿的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对立状态。经过对陶器的分析和考察，杰尔斯塔德断定，到几何陶时期（Cypro-Geometric，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和古风时期（Cypro-Archaic，约公元前750～前480年），塞浦路斯通过自身的文化活力将外来因素和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塞浦路斯风格。[②]

A. M. 斯诺德格拉斯（A. M. Snodgrass）根据新的考古证据和杰尔斯塔德的分析，认为铁器时代塞浦路斯大多数圣所仍建立在青铜时代的旧址上，且墓葬类型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因此，铁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050～前850年）的定居点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上形成的；塞浦路斯的社会政治形态与迈锡尼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也说明塞浦路斯的物质文明延续了青铜时代的特性。同时他指出，塞浦路斯古风时期到古典时期的城市王国也更接近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王国，因此塞浦路斯文明更多受到爱琴文明的影响。[③] 然而，大卫·W. 鲁普（David W. Rupp）的看法与斯诺德格拉斯相左，认为铁器时代塞浦路斯的政治体发展与青铜时代无关，并且铁器时代早期更多受到近东政治经济的影响。他总结了从晚期塞浦路斯ⅢA时期（Late Cyprus ⅢA，约公元前1200/1190～前1125/1100年）到几何陶时期各阶段的社会特征，并依次对每一阶段的政治制度进行讨论。鲁普认为，在晚期塞浦路斯ⅢB时期（约公元前1125/1100～前1050年），塞浦路斯属于酋邦制度而非君主政体，直到古风时期，塞浦路斯三层等级社会结构才逐渐形成，即统治精英—非统治精英—被统治者，分别居住在城市中心、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Gjerstad Einar, *The Cypro-Geometric, Cypro-Archaic and Cypro-Classical Periods*, Vol. Ⅳ, Part 2, Stockholm: Swedish Cyprus Expedition, 1948, pp. 428－478.

② Gjerstad Einar, *The Cypro-Geometric, Cypro-Archaic and Cypro-Classical Periods*, Vol. Ⅳ, Part 2, Stockholm: Swedish Cyprus Expedition, 1948, pp. 428－478.

③ A. Snodgrass, "Cyprus and Early Greek History," The Bank of Cyprus Cultural Foundation Fourth Annual Lecture, Nicosia: Bank of Cyprus, 1988, pp. 5－24.

市周边城镇和农庄。公元前 8 世纪上半叶之后，岛内新兴统治精英为了使权力合法化并表现其权威性，在区域互动的基础上建立了早期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也有学者将这种因与外部地区进行经济和政治活动而形成的早期国家称为次生型国家（Secondary State）。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原因，鲁普认为塞浦路斯受到了腓尼基贸易扩张和两河流域亚述帝国对外扩张的压力和影响，而不是仅仅受到传统意义上的迈锡尼移民影响建立希腊化城市王国。

在 20 世纪“东方—西方二分法”的影响下，大多数学者将塞浦路斯置于东方或西方非此即彼的研究话语体系中。但在“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①] 等思想的启发下，21 世纪的学者们逐渐转向对岛屿内部物质资料延续性的研究。[②] 克林·巴巴拉（Kling Barbara）从陶器类型出发，反驳了以陶器为依据认定有大量迈锡尼移民来到塞浦路斯的传统观点。他运用类型学和地形学的方法，认为迈锡尼ⅢC：1b 的陶器类型在公元前 12 世纪前就已经因为贸易往来存在于塞浦路斯，而且由于已知陶器的数量与全部陶器数量的比例无法确定，因此将这类陶器作为爱琴海大规模移民和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社会转变的依据还需要进一步分析。[③] 路易斯·斯蒂尔（Louise Steel）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她认为爱琴海相关陶器类型的出现和使用源于迈锡尼移民的涌入，因此外来移民应该是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虽然在考古项目中有大量陶器出土，但关于陶器的争论在学术界屡见不鲜，在没有其他资料的证明下，将陶器的变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过程考古学”由 1958 年戈登·威利和菲利普·菲利普斯在《美国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一书中提出，主张强调“社会方面、较宏观的‘过程－解释’，或文化历史中发挥作用的一般性进程研究”。参见〔英〕科林·伦福儒、〔英〕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22 页。

② E. S. Sherratt，“Cyprus and the Near East：Cultural Contacts（1200－750 BC），” in A. Babbi，F. Bubenheimer-Erhart，B. Marin-Aguilera and S. Mühl，eds.，*The Mediterranean Mirror: Cultural Contact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between 1200 and 750 BC*，Mainz：Ro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2015，pp. 71－83.

③ Kling Barbara，“Mycenaean ⅢC：1b and Related Pottery in Cyprus：Comment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in Eliezer D. Oren，ed.，*The Sea Peoples and Their World: A Reassessm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0，pp. 281－296.

④ Louise Steel，“Cyprus during the Late Bronze Age，” in Ann E. Killebrew and Margreet Stei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 8000－332 B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 571－586.

单独作为塞浦路斯青铜时代末期社会转变原因的依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A. 伯纳德·克纳普（A. Bernard Knapp）的看法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斯诺德格拉斯的观点，认为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受黎凡特和爱琴海地区的外来者殖民影响，定居模式改变，新的人口模式和政治制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形成。① 但进入21世纪，他转而认为岛屿的陶器、建筑、墓葬习俗和意识形态在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外来移民对塞浦路斯的影响程度有待商榷，因此无法确认外来“殖民”性质。② 在进一步分析物质文化资料后，他提出用“混杂性”（Hybridisation）文化来解释塞浦路斯的社会发展，并结合岛屿地理因素来分析移民的情况，强调爱琴海地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现象是青铜时代晚期一直存在的社会特征。而公元前12世纪社会转变的影响因素复杂且多样，因此移民的进入并不是社会转变的主要原因，应当结合更多的社会因素来解释这一问题。③ 克纳普对塞浦路斯的移民情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也承认了物质文化的连续性，进而改变了对“殖民”的看法，但鉴于公元前11世纪考古资料的缺乏，他对塞浦路斯政治体的延续性仍持怀疑态度。

受到年鉴学派和“过程考古学”的影响，玛丽亚·亚科沃（Maria Iacovou）从长时段理论出发，以塞浦路斯为中心，认为不应再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比较来界定塞浦路斯的社会转变。④ 虽然她认同外部移民在短期内造成了岛屿的多样性和不平衡，但和克纳普不同的是，她更关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塞浦路斯文化的同质性，⑤ 以及政治体发展的延续性，在她笔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A. Bernard Knapp，“Bronze Age Mediterranean Island Cultures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Vol. 55，No. 2，1992，pp. 52－72.

② Ioannis Voskos and A. Bernard Knapp，“Cyprus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Crisis and Colonization or Continuity and Hybrid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 112，No. 4，2008，pp. 659－684.

③ A. Bernard Knapp，“Migration，Hybridisation and Collapse：Bronze Age Cyprus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Scienze Dell'Antichità*，Vol. 15，2009，pp. 219－239.

④ Maria Iacovou，“Cyprus at the Dawn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Cultural Homogenization Versus the Tyranny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s，”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Oxford：Oxbow，2005，pp. 125－134.

⑤ Maria Iacovou，“Cyprus during the Iron Age I Period（Late Cypriot ⅡC－ⅢA），” in Ann E. Killebrew and Margreet Stei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 660－676.

新政治体的建立应当不晚于公元前 *12* 世纪。[①] 但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和文化同质性在解释新政治体建立过程中的模糊性，关于铁器时代初期塞浦路斯政治体的性质仍存在很大的争论。珍妮丝·萨拉（Janes Sarah）以墓葬记录为基础，同样不再将塞浦路斯的社会转变简单归结为腓尼基或爱琴海地区的“殖民”，更加重视岛屿内外多方面的文化互动。[②] 菲利帕·M. 斯蒂尔（Philippa M. Steele）从青铜时代晚期的文字起源出发，认为塞浦路斯当地的文字不仅受到爱琴海和东方影响，岛内因素的影响同样重要。[③]

以上回顾表明，对于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的社会转变，学者们逐渐从外来民族入侵和“殖民”塞浦路斯的传统观点，转向强调岛屿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但由于考古材料的有限性，对塞浦路斯政治体和物质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解释仍存在很多问题，也留下了许多可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此，下文将利用部分已知的考古材料，尝试总结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社会转变的特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二　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塞浦路斯的变化和延续

近年来，考古学家发现许多晚期塞浦路斯ⅡC－Ⅲ期（公元前 1300～前 1050 年）的物质材料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墓葬类型、语言、陶器等。首先，墓葬地点从城外转移到定居点附近，并且出现了新的墓葬类型。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大多位于城外，到青铜时代末期墓葬似乎聚集在定居点附近，铁器时代早期又回到城外。[④] 其中，位于南部的阿马修斯（Amathus）

① Maria Iacovou，“Historically Elusive and Internally Fragile Island Polities：The Intricacies of Cyprus's Political Geography in the Iron Ag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Vol. 370，2013，pp. 15－47.

② Sarah Janes，“Negotiating Island Interactions：Cyprus，the Aegean and the Levant in the Late Bronze-early Iron Ages，” in P. V. Dommelen and A. Bernard Knapp，eds.，*Material 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Mobility，Materiality，and Mediterranean Identities*，New York：Routledge，2010，pp. 127－146.

③ Philippa M. Steele，*Writing and Society in Ancient Cypr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 5.

④ Maria Iacovou，“Cyprus at the Dawn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Cultural Homogenization Versus the Tyranny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s，”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Oxford：Oxbow，2005，pp. 125－134.

出现了新风格的竖井墓和带墓道的墓室墓。[①] 位于西南的帕莱帕福斯（Palaepaphos）从青铜时代末期开始，长墓道的土堆墓室（earth-dug chamber tomb）取代短墓道或无墓道的晚期塞浦路斯传统墓室成为主要的墓葬类型。[②] 传统观点将这种墓葬变化解释为新移民的到来。

其次，塞浦路斯岛上文字发生变化，语言呈现多样性。青铜时代晚期岛上主要是塞浦路斯－米诺文字（Cypro-Minoan），从表1的铭文数量可知，该文字在晚期塞浦路斯Ⅲ期（公元前1200～前1050年）得到广泛运用，但因为社会政治的变化，这种文字在塞浦路斯几何陶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③] 公元前9世纪，由于腓尼基的扩张和希腊移民，岛上出现了腓尼基语，以及用塞浦路斯音节文字书写的希腊语和原始塞浦路斯语（Eteo-cypriot），[④] 后者可能是由塞浦路斯－米诺语变化而来的。[⑤]

表1 塞浦路斯－米诺语的年代分布

单位：块

年代	恩科米	克提昂	卡拉瓦索斯	帕莱帕福斯	乌加里特	其他地区	总计
晚期塞浦路斯ⅠA期	1						1
晚期塞浦路斯ⅠB期							0
晚期塞浦路斯	2						2
晚期塞浦路斯Ⅰ期到Ⅱ期						2	2
晚期塞浦路斯ⅡA期			2				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Gjerstad Einar, *The Cypro-Geometric, Cypro-Archaic and Cypro-Classical Periods*, Vol. Ⅳ, Part 2, Stockholm: Swedish Cyprus Expedition, 1948, p. 432.

② Anna Satraki, "Cypriot Politi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in M. Iacovou, ed., *Cyprus and the Aegean in the Early Iron Age: The Legacy of Nicolas Coldstream*, Nicosia: Bank of Cyprus Cultural Foundation, 2012, pp. 261－283.

③ Maria Iacovou, "Cyprus during the Iron Age Ⅰ Period (Late Cypriot ⅡC－ⅢA)," in Ann E. Killebrew and Margreet Stei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60－676.

④ Johannes Friedrich 在1932年根据"Eteocretan"创造出来，用以表示在塞浦路斯岛上发现的非希腊语音节文字。Philippa M. Steele, *A Linguistic History of Ancient Cyprus: The Non-Greek Languag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Greek, c. 1600－300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1.

⑤ Philippa M. Steele, *A Linguistic History of Ancient Cyprus: The Non-Greek Languag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Greek, c. 1600－300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8－19.

续表

年代	恩科米	克提昂	卡拉瓦索斯	帕莱帕福斯	乌加里特	其他地区	总计
晚期塞浦路斯ⅡB期	2					8	10
晚期塞浦路斯ⅡA期到ⅡB期	2						2
晚期塞浦路斯ⅡC期	9	5	9		2	8	33
晚期塞浦路斯ⅡB期到ⅡC期	1					2	3
晚期塞浦路斯Ⅱ期	4					2	6
晚期塞浦路斯ⅡC期到ⅢA期	1				5	12	18
晚期塞浦路斯ⅢA期	19	16		1		7	43
晚期塞浦路斯ⅢB期	4	4				2	10
晚期塞浦路斯ⅢA期到ⅢB期	34	1				4	39
晚期塞浦路斯ⅢC期	1	1				1	3
晚期塞浦路斯Ⅲ期到塞浦路斯几何陶时期	1						1
塞浦路斯几何陶Ⅰ期				1			1
塞浦路斯几何陶Ⅱ期				3			3
塞浦路斯几何陶时期		1		2			3
日期缺失	42				1	7	50
总计	123	28	11	7	8	55	232

资料来源：Philippa M. Steele，*Writing and Society in Ancient Cypr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 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再次，塞浦路斯岛上出现了新风格的陶器。这一时期的陶器风格包括爱琴海和黎凡特等多样的装饰风格，[①] 例如爱琴海风格的斯凯佛司杯（Skyphos）和轮制陶器等。许多学者将这种陶器风格的转变与塞浦路斯青铜时代末期的衰亡联系在一起，认为新风格陶器的出现证明有大量移民进入。[②] 但

① Gjerstad Einar，*The Cypro-Geometric, Cypro-Archaic and Cypro-Classical Periods*，Vol. Ⅳ，Part 2，Stockholm：Swedish Cyprus Expedition，1948，pp. 269－281.

② Vassos Karageorghis，“Cultural Innovations in Cyprus Relating to the Sea Peoples，” in Eliezer D. Oren，ed.，*The Sea Peoples and Their World: A Reassessm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0，pp. 255－280.

如上文分析，陶器作为证据的可靠性还有待考察，需要更多的材料加以证明。

最后，塞浦路斯定居点逐渐衰落和破坏。其变化可分为三类。一是被摧毁的定居点，这类定居点数量较少，如铜矿产地阿普利基（Apliki）和内陆腹地辛达（Sinda），可能与近东帝国的侵入有关，但似乎没有对岛屿造成毁灭性影响。① 二是被直接放弃的定居点，数量众多，例如斯库鲁的通巴地区（Toumba tou Skourou）、玛里昂（Maroni）、卡拉瓦索斯（Kalavasos）等地，这些定居点并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三是定居点的功能发生变化后逐渐被遗弃，如岛中部库库尼纳斯地区的阿蒂埃努·班博拉里（Athienou-Bamboulari tis Koukkouninas），根据其考古遗迹，这一地区可能从宗教仪式和铜加工城镇逐渐转变为农产品储存地，直到公元前12世纪被废弃。② 这些定居点大多受到东地中海贸易网崩溃的影响，对铜的外部需求降低，导致岛内很多与铜生产相关的城镇衰落，功能发生转变，人口逐渐迁移。

因此，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确实经历了多方面的变化，墓葬地点转移，多种语言和风格的陶器出现，部分定居点被遗弃等，但不同的地区和物质文化特征仍表现出一定的延续和发展。虽然很多定居点遭遗弃和入侵，但仍有迁移和完整留存的定居点，例如恩科米（Enkomi）和哈拉·苏丹·泰克（Hala Sultan Tekke）两地分别被萨拉米斯（Salamis）和克提昂（Kition）替代，后起的克提昂和另一城镇帕莱帕福斯（Paphos）在这一时期甚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繁荣。还有在这一时期建立的过渡性城镇玛阿－帕雷科思诺（Maa-Palaeokastro）和普拉－科吉诺克雷默斯（Pyla-Kokkinokremos），这似乎表明青铜时代末期的人们曾在这里短暂停留。公元前11世纪新建的位于岛屿中部的伊达里昂（Idalion）则一直留存到古典时期。③ 以上这些定居点的留存和发展，说明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并未遭到彻底摧毁，部分定居点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美〕埃里克·H. 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145、192页。

② Matthew D. Spigelman，“Copper and Cult in Bronze Age Cyprus，” in Artemis Georgiou，ed.，*Cyprus: An Island Culture*，Oxford：Oxbow Books，2012，pp. 133－152.

③ Maria Iacovou，“Cyprus during the Iron Age I Period（Late Cypriot ⅡC－ⅢA），” in Ann E. Killebrew and Margreet Stei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 660－676；A. Georgiou，“The Settlement Histories of Cyprus at the Opening of the Twelfth Century BC，” *Cahiers du Centre d'etudes Chypriotes*，Vol. 41，No. 1，2011，pp. 109－131.

至为古风时期城市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于陶器类型的变化和延续，传统观点认为塞浦路斯青铜时代末期的陶器是迈锡尼、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元素的初步融合，是安纳托利亚人和迈锡尼人入侵塞浦路斯后的物质反应。但根据目前对陶器类型的考察，陶器的数量和类型学研究不足以将陶器类型单独作为社会转变或移民入侵的依据。陶器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迈锡尼ⅢC IB：2 类型陶器在这一时期虽然数量众多，但在晚期塞浦路斯ⅢA 时期之前就已传入塞浦路斯。[①] 因此，目前陶器的变化仅可以证明有外来人口到来或外部通商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才能表明此时有大批外来人口入侵或移民。

在墓葬的考古活动中，虽然发现墓葬地点从城外转移到定居点附近，但是很多地区仍保有传统的塞浦路斯墓室风格。伊达里昂和玛里昂（Marion）等地的墓葬在铁器时代早期都属于塞浦路斯式传统墓，被认为属于外来民族定居地的拉皮索斯（Lapethos）、库利翁（Kurion）和阿马修斯（Amathus）虽然出现了迈锡尼式或叙利亚—巴勒斯坦式的墓葬，但也同样发现了塞浦路斯式传统墓，这说明青铜时代的传统墓葬类型在岛上延续下来。[②] 关于对出现不同类型墓葬的解释，可能是有外国官员或专业人才此时居住在塞浦路斯；[③] 也可能是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岛上的人口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要求改用不同墓葬，或者不同区域的人群汇聚在同一个定居点从而促进集体认同。[④] 因此，虽然青铜时代晚期出现了爱琴海和叙利亚风格的墓葬，但是塞浦路斯的传统墓葬仍然在全岛占重要地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Kling Barbara，“Mycenaean ⅢC：1b and Related Pottery in Cyprus：Comment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in Eliezer D. Oren，ed.，*The Sea Peoples and Their World: A Reassessm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0，pp. 281 – 296.

② Gjerstad Einar，*The Cypro-Geometric, Cypro-Archaic and Cypro-Classical Periods*，Vol. Ⅳ，Part 2，Stockholm：Swedish Cyprus Expedition，1948，pp. 431 – 432.

③ Priscilla Schuster Keswani，“Hierarchies，Heterarchies，and Urbanization Processes：The View from Bronze Age Cyprus，”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Vol. 9，No. 2，1996，pp. 211 – 250.

④ Sarah Janes，“Negotiating Island Interactions：Cyprus，the Aegean and the Levant in the Late Bronze-early Iron Ages，” in P. V. Dommelen and A. Bernard Knapp，eds.，*Material 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Mobility，Materiality，and Mediterranean Identities*，New York：Routledge，2010，p. 131；Maria Iacovou，“Cyprus at the Dawn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Cultural Homogenization Versus the Tyranny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s，”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Oxford：Oxbow，2005，pp. 125 – 134.

此外，塞浦路斯的政治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岛上的区域性政治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到公元前12世纪，塞浦路斯公共建筑和行政中心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不同的建筑风格在岛屿各地独立发展。[①] 同时，岛上显著的高等级墓葬分布范围广，却没有特别突出的王室墓葬，因此考古证据不足以证明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是统一的国家，将该岛看作通过贸易将分散独立定居点联系在一起的集合体更为合适。[②] 尽管在埃及阿马尔纳的莎草纸文献和乌加里特的楔形文字泥板上，阿拉西亚（Alashiya）王国是某一时段在恩科米出现的统一政权，但考古资料证明此时岛上仍是区域政治体的集合。因此，塞浦路斯的区域政治一直持续到铁器时代的王国时期，没有统一的政权，即使古典时期萨拉米斯国王埃瓦格拉斯有这样的尝试，也因各方面影响没有成功，直到希腊化时期埃及托勒密王朝将整个塞浦路斯占领。

这一时期东地中海的贸易网“崩溃”，国家间贸易往来彻底断裂，但塞浦路斯与东地中海的其他贸易仍在持续。尽管规模比公元前12世纪之前小得多，但在腓尼基发现了塞浦路斯式陶器和其他手工艺品，在撒丁岛和克里特岛发现多个公元前12～前11世纪的塞浦路斯式青铜制品和陶器等物品，[③] 塞浦路斯本地也出土了迈锡尼风格的物品，这些物质资料的流通似乎说明，在塞浦路斯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岛上留存的港口仍然与地中海周边地区存在贸易往来，[④] 并且形成了新的贸易模式。[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Priscilla Schuster Keswani, “Models of Local Exchange in Late Bronze Age Cypru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292, No. 1, 1993, p. 74.

② A. Bernard Knapp, “Migration, Hybridisation and Collapse: Bronze Age Cyprus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Scienze Dell'Antichità*, Vol. 15, 2009, pp. 219 – 239.

③ A. Bernard Knapp, “Bronze Age Cyprus and the Aegean: ‘Exotic Currency’ and Objects of Connectivity,” *Journal of Greek Archaeology*, Vol. 7, No. 23, 2022, pp. 67 – 93.

④ Anna Satraki, “Cypriot Politi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in Maria Iacovou, ed., *Cyprus and the Aegean in the Early Iron Age: The Legacy of Nicolas Coldstream*, Nicosia: Bank of Cyprus Cultural Foundation, 2012, pp. 261 – 283; A. Bernard Knapp, “Bronze Age Cyprus and the Aegean: ‘Exotic Currency’ and Objects of Connectivity,” *Journal of Greek Archaeology*, Vol. 7, No. 23, 2022, pp. 67 – 93.

⑤ Maria Iacovou, “From the Late Cypriot Polities to the Iron Age ‘Kingdoms’: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Cyprus from Within,” in A. Cannavò and L. Thély, eds., *Les royaumes de Chypre à l'épreuve de l'histoire: transitions et ruptures de la fin de l'âge du Bronze au début de l'époque hellénistique*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Supplément 60), Athens: 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 2018, pp. 7 – 28.

最后，铁器时代初期出现的原始塞浦路斯语可能是青铜时代晚期塞浦路斯－米诺语的延续。[①] 虽然在公元前9世纪塞浦路斯文字记录有一个间断期，但是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都发现了音节文字，且二者具有亲缘关系，因此塞浦路斯的文字以某种形式得以延续。

综上所述，塞浦路斯作为地中海东部最大的岛屿和海上交通要道，在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但与迈锡尼、赫梯和黎凡特等地文明的衰亡不同，塞浦路斯在青铜时代末期的衰败中开出了“希望之花”。虽然经历了定居点遗弃、语言多样化和陶器样式的变化，但是传统塞浦路斯墓葬类型的延续、贸易的往来和岛屿内部的区域性发展，都说明该岛在青铜时代末期的社会转变中呈现在变革中延续的特点。

三　影响塞浦路斯社会转变的内外部因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从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引起塞浦路斯社会转变的原因复杂多样，既包括外部文明冲突的影响，也包括岛屿气候、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内部因素的作用。

1. 外部文明的影响

青铜时代中晚期，东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开始扩大，塞浦路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铜矿资源，成为贸易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周边文明联系密切。根据埃及出土的阿马尔纳信件[②]和近东多种楔形文字泥板提供的资料，塞浦路斯与东地中海各政治体既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也有密切的外交联系。例如在与塞浦路斯相关的9封阿马尔纳信件中，[③] 埃及法老

① Philippa M. Steele, *A Linguistic History of Ancient Cyprus: The Non-Greek Languag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Greek, c. 1600 – 300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3.

② Anson F. Rainey and William M. Schniedewind,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Boston: Brill, 2015, pp. 1375 – 1386. 从阿马尔纳信件可知塞浦路斯和埃及之间的铜贸易以及可能的贸易路线：从塞浦路斯运输铜产品到埃及，返回时埃及装载金银和其他物品，或许还会从迦南装载谷物，最后回到塞浦路斯。

③ Anson F. Rainey and William M. Schniedewind,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Boston: Brill, 2015, pp. 332 – 357, 1375 – 1386.

和塞浦路斯统治者互称兄弟，双方使节来往频繁，法老举行登基仪式时，塞浦路斯统治者会送礼品到埃及祝贺。塞浦路斯与埃及之间的主要贸易商品为铜，双方的每封信件中都曾提及与铜相关的物品，埃及则回以金银、纺织品等器物。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塞浦路斯与乌加里特王国来往密切，来自乌加里特的泥板文书显示，[①] 青铜时代末期乌加里特是较塞浦路斯低一级的政权，在受到外族侵犯时曾向塞浦路斯求助，但在回信中，塞浦路斯认为乌加里特并非受到外族攻击，而是内部倾轧导致灾难，因此没有提供援助。

考古资料显示，青铜时代末期塞浦路斯曾受到外部力量入侵，带有防御工事的定居点辛达在约公元前 1225 年遭到强力摧毁。[②]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暗示该地受到赫梯或亚述帝国的侵犯。根据赫梯泥板文书记载，国王图特哈里四世（公元前 1237 ~ 前 1209 年在位）和苏庇路里乌玛二世（公元前 1207 年开始在位）在统治期间都武力占领过塞浦路斯，[③] 其间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公元前 1233 ~ 前 1197 年在位）因与图特哈里四世的战争也短暂接管过塞浦路斯。[④] 但在同时期其他定居点的考古活动中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战争痕迹，这似乎表示岛屿内部躲过了近东帝国的外来攻击。[⑤] 可能的解释是，此时的赫梯国力衰微，两次入侵仅为了夺取塞浦路斯的铜矿资源，获得名义上的统治，但并没有实质占领；而亚述在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之后，爆发王位之争陷入内乱，[⑥] 因此二者都无法在塞浦路斯维持长久的统治。

此外，塞浦路斯与周边大陆虽然联系密切，但受限于青铜时代的船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美〕埃里克·H. 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 1177 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 16 页。

② 〔美〕埃里克·H. 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 1177 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 192 页。

③ 〔美〕埃里克·H. 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 1177 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 145、192 页。

④ 孙宝国：《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研究（公元前 1600 – 前 110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 31、49 页。

⑤ 〔美〕埃里克·H. 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 1177 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 195 页。

⑥ 孙宝国：《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研究（公元前 1600 – 前 110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 31 页。

和航海技术，未出现强有力的战船——目前尚未有战船的相关考古记录，只有来自陶器上的艺术描绘，到古风时期才出现50桨战船和双列桨船，公元前6世纪出现三列桨战船。[①] 因此，无论是公元前14～前13世纪埃及和赫梯因叙利亚地区爆发冲突，还是青铜时代末期危机时期赫梯和亚述入侵塞浦路斯，因受限于航海技术等客观条件，战争似乎都发生在海岸附近，塞浦路斯的岛内定居点并没有受到大规模破坏。[②]

周边政治体对塞浦路斯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贸易方面。由于铜等金属产品是塞浦路斯的主要出口产品，岛屿政治体的兴衰与这类主要贸易产品的风险相关。[③] 青铜时代末期，当外部市场需求减少，或者金属贸易所依据的国际体系发生巨大变化时，那些依靠铜贸易的定居点就会发生动荡，例如位于特罗多斯山脚下因采矿而发展的定居点功能发生改变，甚至遭到废弃，同时定居点中的人群也会随之流动，转移到海滨或农业地区以求生存。塞浦路斯虽然曾遭遇暴力入侵，但由于造船、航海技术落后，入侵者的数量较少和岛屿地理位置的优势，并没有对其造成破坏性的后果，而此时呈现衰落景象的主要原因，更可能是岛屿内部为应对东地中海贸易的衰落而进行的社会转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2. 自然条件的影响

青铜时代末期，东地中海周边政治体的入侵和贸易体系的崩溃等外部因素使得塞浦路斯的部分定居点遭到破坏和遗弃。但近年来，有很多学者也关注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对社会转变造成的深远影响。学者们运用古生物技术将塞浦路斯和叙利亚沿海地区的花粉数据进行对比，发现青铜时代末期的危机与距今3200年的三百年干旱期吻合。[④] 忽然到来的干旱期加剧

① 〔英〕莱斯利·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古代希腊社会生活》，张强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152～154页。

② 〔美〕埃里克·H. 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第195页。

③ Maria Iacovou，“Cyprus during the Iron Age I Period（Late Cypriot ⅡC－ⅢA），” in Ann E. Killebrew and Margreet Stei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Fress，2013，pp. 660－676.

④ D. Kaniewski，E. Van Campo，J. Guiot，S. Le Burel，T. Otto et al.，“Environmental Roots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risis，” *PLOS ONE*，Vol. 8，No. 8，2013，p. 10.

了塞浦路斯的社会转变，甚至影响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①] 干旱造成农作物歉收、土地贫瘠和饥荒，从而催生或加速了社会经济危机，在塞浦路斯则表现为定居点的迁移，部分海港地区如恩科米和哈拉·苏丹·泰克因为港口淤塞分别迁往萨拉米斯和克提昂。气候的变化使得塞浦路斯人口缩减和迁移，但受益于仍然持续的贸易交流和内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岛屿社会并没有因此停摆。

在应对外部的冲突和内部转变时，尽管塞浦路斯遗弃了部分定居点，但作为地中海第三大岛屿，该岛仍是东地中海海上交通要道和贸易枢纽。早在公元前17世纪青铜时代早期，塞浦路斯已经和克里特岛、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的商业地区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海上贸易网络。[②] 公元前15～前14世纪迈锡尼文明崛起，贸易网愈加繁荣，地中海周边文明联系更加密切。公元前12世纪危机来临，东地中海贸易网断裂，虽然繁荣的铜矿和奢侈品贸易受到影响，但是日常物品的贸易没有中断，[③] 岛屿贸易枢纽的身份未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塞浦路斯与外界仍有一定的贸易往来。

丰富的铜矿和农业资源也使塞浦路斯内部的区域合作系统在“危机”时期维持了正常的运行，保障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和发展。这种岛屿内部的区域合作系统形成于青铜时代中晚期，[④] 即金属开采区、粮食生产区和可进行沿海贸易的港口城镇三方合作，[⑤] 其中西南部的特罗多斯山脚是主要的铜矿产地和加工场所，因铜矿开发兴起了一批从事金属开采和加工的城镇，[⑥] 例如阿普利基和阿赫拉（Akhera）；东部的梅萨奥里亚（Mesaoria）平原地区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能够为居民供应粮食；海岸港口城市如恩科米/萨拉米斯、克提昂和帕莱帕福斯则主要负责进出口贸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控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李政：《赫梯帝国灭亡再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第58～75页。

② 湖北省博物馆编《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文物出版社，2016，第26页。

③ 〔英〕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徐家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74页。

④ Priscilla Schuster Keswani and A. Bernard Knapp, “Bronze Age Boundaries and Social Exchange in North-west Cyprus,”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22, No. 3, 2003, pp. 213－223.

⑤ Hector W. Catling, “Patterns of Settlement in Bronze Age Cyprus,” *Opuscula Atheniensa*, Vol. 4, 1962, pp. 129－169.

⑥ A. Bernard Knapp, “Production, Exchange, And Socio-Political Complexity on Bronze Age Cyprus,”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5, No. 1, 2007, pp. 35－60.

制着相关的合作城镇。[①] 因此，尽管青铜时代末期国际贸易网断裂，定居点大量被遗弃，但仍有部分加工点留存，部分港口城市与外界保持商贸交流，使得岛上的这种三方合作系统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②]

此外，很多学者似乎忽略了塞浦路斯作为岛屿这种特殊的社会类型在应对危机时的反应。吕西安·费弗尔曾说，“岛屿是指地球上那些为周遭水域与其他陆地隔开的支离破碎地块，它们为此也有效地避免了外来入侵，这在古老的历史时期尤为如此……”[③] 与大陆分隔的岛屿，不论是在动植物演化还是政治经济历史方面，都可被分为独特的社会类型。虽然塞浦路斯岛上有不同文明存在的痕迹，“当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后，总会在这片海岸上留下某些印记”，[④] 但岛屿特色并没有随着这些民族变迁而发生根本改变，如同西西里岛受到不同民族统治仍保有文明独特性，塞浦路斯也同样保持着自身的文明特色。上文提到从青铜时代延续到铁器时代的塞浦路斯传统墓葬、具有亲缘关系的塞浦路斯－米诺语和原始塞浦路斯音节文字等，都说明塞浦路斯一直保有自身独特的文明特征。尽管岛屿在这种地理封闭的“边界效应”中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封闭的环境也为岛屿提供了保护，可谓风险和收益并存。[⑤] 例如，塞浦路斯在“危机时代”后孕育了新的贸易方式，从而改变了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因此，凭借孤立封闭的地理位置，塞浦路斯在青铜时代末期的危机中，保留了日后发展的希望。

总之，青铜时代末期地中海东部文明衰亡，塞浦路斯在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破坏，但因其自然资源丰富、独特的岛屿社会类型和稳定的区域合作系统没有遭遇毁灭性的破坏，岛屿部分定居点得以留存继续发展，为铁器时代众多的城市王国奠定了基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

① Priscilla Schuster Keswani and A. Bernard Knapp, “Bronze Age Boundaries and Social Exchange in North-west Cyprus,”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22, No. 3, 2003, pp. 213－223.

② Maria Iacovou, “Historically Elusive and Internally Fragile Island Polities: The Intricacies of Cyprus's Political Geography in the Iron Ag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370, 2013, p. 31.

③ 〔法〕吕西安·费弗尔：《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231页。

④ 〔法〕吕西安·费弗尔：《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250页。

⑤ A. Bernard Knapp, “Bronze Age Mediterranean Island Cultures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55, No. 2, 1992, pp. 52－72.

结 语

塞浦路斯是东地中海面积最大的岛屿，青铜时代中晚期因其丰富的铜矿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地中海贸易网中的重要成员。随着青铜时代末期诸文明衰亡，塞浦路斯确实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但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显示，该岛仍有部分物质文化特征得以延续，不仅有持续繁荣的定居点，塞浦路斯－米诺语和青铜时代传统墓葬类型也同样延续到了铁器时代初期，还有与地中海其他地区未曾中断的贸易往来，可能对铁器时代早期或几何陶时期东地中海贸易网络的恢复和各地区文明的重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尽管青铜时代末期气候干旱和贸易需求量下降，使塞浦路斯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但是自给自足的资源、远离陆地纷争的地理位置等因素，令塞浦路斯的物质文化在“危机”时代得以幸存，因此多重因素影响了塞浦路斯的社会转变，不可简单归于外族入侵或东地中海贸易断裂。自然资源、技术发展和岛屿类型等因素都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发挥着作用。只有结合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才能获得全面的理解。

青铜时代末期的社会转变是东地中海地区每个文明所经历的共同问题。不同族群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塞浦路斯作为东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其在青铜时代末期的社会转变中呈现了在变化中延续的特征，表现出不同文明应对社会转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仅从塞浦路斯整体角度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不同区域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分析。

［责任编辑：龙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